

Cadre Training of PLA in the 1950's

20世纪50年代人民军队的干部训练工作

★ 张首伟 李 果

摘要：干部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20世纪50年代，中央军委根据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的新的使命任务，突出强调干部训练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针对干部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实际情况，首先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为干部训练奠定了文化科学基础。同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实行轮换作战，充分利用战争实践训练干部；大力发展军事院校，通过院校教育训练干部；开展以干部为重点的军事训练，提高干部作战指挥和组织部队训练的能力。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 军事训练 干部训练

中图分类号：K271 E29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20)03-0053-06

军事训练是军队在和平时期发展建设的中心工作，是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主要途径。干部训练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方面，历来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进行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并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这种转变和发展在军事训练和干部训练上得到充分体现。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①，更是将干部训练摆在突出位置。本文尝试对这一时期军队干部训练工作及其特点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以为当前做好这一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适应军队职能任务的历史性转变，突出干部训练的重要地位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作战，训练只能通过“以战教战”、整训、临战应急训练等方式见缝插针地进行。^②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就强调部队以后的教育训练，要抽专门人才，设专门学校来做。^③1950年5月，全军参谋会议召开，会议旨在研究部署军队整编复员工作，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会议同时认为：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整编复员，但是干部数量却不能减少，而且需要更多的训练。由于长期作战，人民解放军干部尤其是中下级干部没有认真训练过。未来战争规模更大、更剧烈，而现有干部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来说都不够用，必须加紧培养。7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会议，会议认为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主要靠军事训练，而指挥员的训练是训练工作的重中之重。^④为加强对全军训练工作的领导，1950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训练部，隶属军委总参谋部。1950年11月，第一次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全军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建军传统、军事思

【作者简介】张首伟，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处长；李果，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② 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221页。

③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220页。

④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404页。

想及军事、政治、文化教养程度——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的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步、炮、装甲、工、通信、交通、骑、化学、伞兵等）的联合作战与协同动作，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部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①会议对指挥员的训练方针进行了具体阐释，同时认为指挥员训练之于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有“加速”作用。

虽然成立了专门的训练领导机构，明确了部队及指挥员的训练方针，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全军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未能展开。在朝鲜战场局势基本稳定后，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52年7月，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毛泽东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②与1949年10月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的军队“四个统一”相比，训词中增加了“统一的训练”这一内容，并指明正规化的训练是军队正规化的先决条件。1952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会议要求以苏联经验为蓝本，结合中国实际，作为部队训练的方向，并决定于1953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统一思想认识，全面展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央军委于1953年底组织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认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现代战争知识并且掌握现代科技的干部是不可能的，强调训练干部的工作是建设现代化军队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要求把干部训练作为今后的首要任务。^④这一要求，明确了干部训练的重要地位。

二、首要任务是提升部队文化水平，为干部训练奠定科学文化基础

毛泽东早在1944年就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历来非常重视军队的文化教育，认为官兵文化水平的高低跟部队战斗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干部作为军队的骨干力量，提升其文化水平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后，军队要掌握现代化的装备技术，逐步建立现代化的编制体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防军，这对部队文化素质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1950年4月，朱德指出：“部队必须很好的加强整训，我们部队在阶级不消灭之前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军队近代化的科学知识，学习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方法和技术，因此必须首先加强文化学习。没有文化，这个任务就完不成。”^⑥但是，军队大多数干部都出身于贫苦的工农家庭，文化基础较差，加之长期征战，更无暇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因此，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据统计，解放战争基本结束时，人民解放军干部高小以下文化程度占68%，还有不少处在文盲、半文盲的水平。^⑦有的营参谋长作计划，不会动笔，只能画符号代替；有的连长讲军事课像唱“双簧”，让文书念课本，自己讲解。可见，军队尤其是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的状况，已不适应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需要。

针对这种状况，1950年5月召开的全军参谋会议将提升指战员的文化水平作为会议的一个重要问题。

① 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第221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③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④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第8～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

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306页。

⑦ 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第221页。

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文化不高，技术不高，要建设近代化的军队就非提高不可……必须把我们现在的干部和战士提高起来，要全军进行学习，把连队变成学校，大量开办小学、中学。”^① 全军参谋会议决定在三年内使全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普遍提高一步。1950年8月1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颁布《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②，并且强调“各级干部，首先是经历多年斗争而文化水平甚低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凡能离职学习者，均应由各级领导机关有计划地分批或轮流抽调，经过考试，送入速成小学，或速成中学，或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去学习”^③。该指示还对干部学习后要达到的文化水平等事项进行了明确。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原定于从1951年1月开始的系统文化教育被推迟。朝鲜战场局势趋于稳定后，1951年1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一九五二年军队训练的指示》，指出：“决定一九五二年全军除海、空军及雷达等部队之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为贯彻这一指示，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重点研究部署1952年全军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军文化教育以干部为首要，一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其学习均以文化为重点，主要抓紧在职学习，同时，大量举办文化速成学校，以便大多数干部能入校学习。^④ 12月28日，为保证部队有更多的军事干部参加文化学习，中央军委颁发《关于抽调军事干部入文化学校或军事学校进行学习的决定》，决定在1952年抽出大部军事干部进入文化学校或军事学校学习，步兵军、师、团、营四级的正副指挥员和参谋长中，留下一人在部队主持工作，其余干部均脱产学习。^⑤

1952年6月1日到1953年上半年，全军正式展开了以干部为重点的文化教育运动。运动中，全军以50%的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育，30%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20%的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到1953年，绝大多数干部达到了高小毕业或初中文化水平。^⑥ 经过文化教育运动，许多原是文盲的干部都可以做军事教育计划，能写工作报告了，部队干部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信心由此大大增强。以干部为重点为期一年的文化教育活动，直接为1953年6月展开的全军第一次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奠定了重要的科学文化基础。

三、实行部队轮换作战方针，利用抗美援朝战争实践训练干部

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强敌的包围之中，长期频繁的作战，使干部难以专门抽出时间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但是，广大部队干部通过作战，逐渐提升了自身的技战术水平，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毛泽东曾指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⑦ 朝鲜战争的爆发，虽然打破了人民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建设计划，但也使部队经受了现代战争的锻炼，获得了与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美军作战的新经验。毛泽东高度重视向广大部队干部传授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作战经验。1951年5月，在给时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希望你秋季再去广州一次，检查各军的工作和海防工作。你去时最好再找一二个在朝鲜作战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同去广州，向干部们作报告，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⑧

①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75页。

④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310页。

⑤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54页。

⑥ 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第39页。

⑦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01页。

⑧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86页。

同时,由于朝鲜战场志愿军部队伤亡消耗较大,1951年4月,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希望部队能够换班,轮换作战能使更多部队和干部接受实战训练。在电报中,邓华建议:“另一方面,与这种高度现代装备的敌人在朝鲜作战是有许多新的经验,故全国军队和干部来轮流实践学习,根据今后形势的发展和建军建设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同时照顾运输情况,故建议在朝部队视情况每满十月至一年则大换一次,干部亦应如此,这样,各方面都有好处。”^①1951年6月,朝鲜战场形势趋于稳定,中央军委曾决定采取“轮番与换班相结合”的方针,但根据具体情况,并没有作出部队立即换班的计划。1952年6月,根据美方拖延停战谈判,战争可能持续延长的实际状况,中央军委确定了志愿军第一期部队轮换计划,决定用国内完成整编的第23、第24、第46军替换在朝作战的第20、第27、第42军。7月,邓华建议不仅轮换3个军,在朝鲜的所有的部队都应该轮换,并提出了各技术兵种部队、技术兵种指挥所、各兵团指挥员和兵团机关的轮换设想。中央军委原则上同意了他的建议。8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②

截至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全国步兵部队共25个军76个师直接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占国防军步兵总数的70%。此外,41%的空军部队、73%的炮兵部队、57%的工兵部队、60%的防空部队、11.7%的公安部队和100%的铁道兵部队都参加了轮换作战,获得了现代化战争作战经验。^③同时,为了利用朝鲜战场锻炼高级指挥员和高级指挥机关的干部,1952年12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做出轮换志愿军及其各兵团司、政、后部分机关干部的计划。1953年4月,毛泽东签署命令,决定将志愿军一些高级干部和国内干部进行轮换,如调李达任志愿军参谋长,调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另外,毛泽东还指示总参谋部和各大军区组织干部到朝鲜战场参观见学。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底,总参谋部先后分4期组织干部赴朝实习,1953年又组织高级指挥员到朝鲜战场代职。朝鲜战场部队轮换作战和干部轮换见学,使军队大批干部得到了实战训练,积累了现代条件下作战和指挥经验。同时,朝鲜战争也使广大干部意识到军队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紧迫性,为全军开展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奠定了思想基础。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轮换作战和干部轮换见学,是人民军队通过战争学习战争,通过战场实践训练干部的新运用。

四、大力发展军事院校,主要依靠院校教育培养和训练干部

院校教育作为训练干部的重要途径,在革命战争年代就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高度重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共建立了7所军政大学和22所分校,培养了大量军政干部,新中国成立时,全军各类院校已有29所。^④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中央军委更加重视军队院校建设。1950年5月,全军参谋会议决定要健全正规的军队院校教育体系;6月,军事学校管理局成立,隶属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7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会议研究院校建设问题,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基础上,改建、新建一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正规军事院校;11月,第一次全军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召开。会后,中央军委批转了军训部《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部队训练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要建设一定数量并且正规的各类军事院校,并就院校建设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⑤1951年底,军队开始大规模精简整编。1952年5月,聂荣臻、粟裕以总参谋部名义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全军各级步兵学校调整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各大战略区学校培养方针与内容不统一,且质量不高,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220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16页。

③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223~224页。

④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第479页。

⑤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61~63页。

为造成全军更好的统一与集中的有利条件，首先必须统一干部的培养方针与内容，提升培训质量。^①聂荣臻、粟裕就海、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学校以及后勤系统学校的调整问题，先后向中央军委提交了报告。这3个关于院校调整的报告，毛泽东均批示同意。1952年6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调整军事学校命令》，全军院校开始调整整编。这次整编初步建立了三级指挥院校体系，增建了一些技术院校，全军院校建设逐步走向正规。1952年至1953年，总参谋部又先后颁发了《陆军军事学校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校教学工作条例》，进一步统一了院校建设思想，强化了院校正规化建设。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要主要依靠办好院校来培养干部。^②

在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下，20世纪50年代成为军队院校建设的繁荣时期。1950年7月之后，根据军委部署，首先将新中国成立前建立的院校改建为5所高级步兵学校、24所初级步兵学校和一些专业技术学校，并新创办了一批院校。^③1950年10月，毛泽东致电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速到北京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11月，刘伯承呈送毛泽东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报告，建议陆军大学改名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南京，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任命刘伯承为院长。军事学院是培养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综合性军事学府，它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军院校教学正式开始了正规化、合成化。毛泽东称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④。1952年至1953年，经毛泽东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军事工程学院相继成立，毛泽东亲自为上述院校题词。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毛泽东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⑤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培养现代专业后勤干部、合同战术指挥员和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开始。1954年，为适应各军兵种快速发展的状况，加强技术兵种建设，刘伯承向军委建议在军事学院的基础上建立高等军事学院和军兵种专业院校，中央军委赞同刘伯承的建议，并责成有关单位开始筹建军事学院分院。1956年至1958年，分别以军事学院战役系、战史系、炮兵系、海军系、装甲兵系和空军系为基础，相继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炮兵学院、海军军事学院、装甲兵学院和空军学院。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成立，它是人民解放军培养高、中级政治工作军官和理论研究骨干的高等学府。1958年底，原军事学院和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旨在培养中级指挥干部。到1959年，全军院校共129所，总人数约为25.3万人，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指挥、政治、后勤和专业技术院校在内的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9年，全军院校共为部队输送干部26.9万多名，为促进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⑥

五、开展以干部为重点的军事训练，提高干部作战指挥和组织部队训练的能力

院校教育是系统全面训练干部的主要途径，但是在部队大批干部不能抽调入学的情况下，干部的在职训练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明确主要依靠院校来培训干部的同时，也强调不放松干部的在职训练。干部的在职训练主要依靠集训、轮训、演习等方式进行。

1952年下半年，在全军第一次统一正规的训练高潮到来之前，中央军委提出了轮训干部为部队训练做准备的计划，认为“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⑦。

①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318页。

②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第9页。

③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第480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89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1页。

⑥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第483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此时提出轮训干部，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1952年6月，全军开始了为期一年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但是，一些部队在执行这个方针上产生了偏差，出现了放松军事训练和纪律松弛的现象，甚至将“文化教育作为训练的中心”解释为“文化教育是全军的中心工作”。为此，1952年10月毛泽东签发《军委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要求：“应采取分期轮训干部的办法，从明年一、二月间开始，实行军事干部的轮训，预习部队军事训练的各种科目，为开展部队军事训练准备条件。”^① 1952年12月召开的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将干部集训列为全军正规军事训练准备的中心工作，还对干部集训提出了四项目标要求，即干部要了解训练计划的内容，要学会制订各项训练计划，要学会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方法，要学会组织检查和向上级报告。^② 据此，全军于1953年上半年，采取课堂讲授、示范演习、按组集团作业、实弹战术演习等方式，循序渐进地对陆军师、团、营、连、排五级干部进行了教学法集训，使广大干部基本掌握了本级教学的内容、程序和方法，为1953年下半年开展统一正规的军事训练做好了准备。

全军军事训练实现统一正规后，干部训练仍然是重中之重。1954年颁布的训练计划大纲由部队训练、指挥员训练和司令部训练三部分组成。指挥员训练和司令部训练是部队训练的准备，占有重要地位。为提升干部的军事业务能力和任教水平，从1954年起，全军各部队普遍展开了教学法集训。1955年度训练开始之前，炮兵共组织3.1万余名干部参加了指挥员教学法集训；工兵也对干部开展了各类集训，从1953年到1955年共集训、轮训干部骨干17642人；1955年11月，鹰（潭）厦（门）铁路施工部队，组织连排干部进行施工技术应急集训；1954年8月，公安部队组织举办了内卫、边防业务和海上巡逻干部集训。^③

为提高指挥员和司令部机关现代战争指挥能力，全军组织展开了一系列战役、战术集训和演习。1954年5月，中央军委在北京组织了全军高级干部集团军防御战役集训，共有200余名干部参加；10月，总后方勤务部组织129名全军后勤高级干部进行了以集团军防御战役为背景的后勤战役集训；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军区，空军，炮兵也都分别组织了防御战役、战术集训或演习；西北军区组织了师团干部集训；海军组织了高级干部抗登陆战役集训；装甲兵组织了师、团两级首长司令部演习。^④ 1955年，根据年度训练指示，全军展开在核、化学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各军区和军兵种相继开展了相关的干部集训。1955年11月，总参谋部在辽东地区组织了陆、海、空三军参加的，在使用核、化学条件下的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演习。此次演习是人民解放军在20世纪50年代训练高潮的标志。陆、海、空三军18个师以上指挥机关和32个实兵团参加了演习，全军809名中高级干部随演习部队一起进行了演习作业和参观见学。通过这些集训和演习，各级干部初步掌握了现代战争战役战斗的特点和组织协同作战的程序方法，作战指挥和组织部队训练能力有了较快提高，部队整体作战水平也随之提升。

结语

军队干部是军队建设的关键，是构成部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之一。20世纪50年代，军队关于加强干部训练的一系列成功做法和经验，对于新时代搞好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增强干部队伍素质、提高部队战斗力，仍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尤其是当前人民军队正处于改革转型期，全面加强干部的教育训练，推动军队干部队伍从思想水平到政治素养、从实际作战本领到职业精神品格的全面提升，是新时代扫除和平积弊、实现强军目标的时代之需，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急切呼唤，更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杨 涓]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71页。

②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377页。

③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第67～68页。

④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第68～69页。